

汉唐时期官员服饰制度考述

李 怡

(北京科技大学 人文素质教育中心, 北京 100083)

摘要: [研究意义] 官员服饰制度是汉唐时期政治运转、国运变迁的晴雨表, 不仅在服饰史、社会史研究中具有突出意义, 更可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 从而拓展中国古代史研究范畴。 [研究方法] 文章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相关正史、典章制度史等进行缜密爬梳, 在此基础上对汉唐时期官员服制制度的发展变迁进行纵向大历史视野的文化审视。 [研究结果和结论] 作为帝国树立皇权威严、颁行教化正统的重要措施和外在表征, 且出于历代服饰发展政治性与融合性统一的时代需要, 汉唐各朝通过不断调试、努力改进, 逐步建立适合自身法统与道统的官服体系, 因此汉唐时期官员服饰制度经历了汉魏初创、南北朝融合、隋唐成熟的螺旋上升的过程, 从而为强化集权统治、维护大一统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汉唐时期; 官员; 服饰制度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2095-4131-(2019)04-0010-05

A Study on the Apparel System of Officials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LI Yi

(Center for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official costume system is a barometer of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and national movement changes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t not only has a prominent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costume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but also can be used as an entry point to deepen the study of cultur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thu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The article mainly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carry on the meticulous comb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n this basis to the Han Tang Dynasty official service system development vicissitude carries on the longitudinal big historical view cultural review.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and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empire's establishment of imperial authority, the promulgation of education orthodoxy, and the need of the era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ostumes,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ir own legal systems through continuous debugging and efforts to improve. And the official service system, Therefore,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official costume system experienced a spiral upward process of the start-up of Han and Wei, the fusion of the

收稿日期: 2019-06-13; **修回日期:** 2019-07-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6YJC760030)

通信作者: 李怡, 北京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maturity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Key words: Han and Tang Dynasties; officials; apparel system

汉唐时期自公元前 202 年刘邦建汉至公元 907 年朱温篡唐共 11 个世纪,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体制从建立、巩固到瓦解、重建的第一个大循环,其连绵不绝、异同相间之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特点与规律。据此,在纵向大历史视野下,汉唐时期官员服饰制度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历代不断继承、调整及创新的产物。

1 汉魏官员服制的正统初创

秦朝一统天下,打破了战国以来各国原有的服饰典章制度,“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赐百官,而先王服章于是残毁矣。”^[1]秦朝依据战国邹衍的五行学说,服色尚黑,继而官员郊祀之服皆以衿玄。在反思秦亡历史教训基础上,西汉初期对以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采取兼容无为的政策,一方面采撷秦制,另一方面则吸纳民间习俗,遂将多重因素杂揉于官员服饰制度之中,即改革先秦以来祭服之六冕制,且执祭官员在每年五郊之祭时朝服穿着各依方色,其他随祭官员则着玄冠绛衣的常服。由此可见,虽然朝服被定为随季节、方位变更的五色,且匹以土德而色尚黄,但实际上基本以上衣下裳式的黑色衿玄服为主,并以佩印的形制材料及绶的疏密长短来粗略区分职位官阶。因此,在正统史家看来,西汉终其二百余年没有正式确立官服制度,“西京礼文,本与秦仪杂就。而车服之制,因陋就简,是以班史无传焉”^[2],这不仅是因为其服饰形制、制度简单粗陋,更因为服饰强化等级、辨明尊卑的政治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西汉之后新莽时期官员服饰制度的短暂复古以失败落幕,这样时代的洪流遂推动后继王朝必须对官员服饰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了。

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必须建立相应的意识

形态,文化统一成为必然。东汉建武二年(26年)正月,光武帝在洛阳建立社稷与高庙,并以开国皇帝身份下令更改西汉之土德、色尚黄的传统,要求该朝崇尚火德而色尚赤,至此舆服服色才确定了正统之位。经过汉光武帝定制,东汉确立服色尚赤的指导原则,遂对官员服饰制度产生深远影响。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下诏参照先秦以降至两汉被奉为经典的《尚书》《礼记》《周礼》等典籍,制定出一套等级划分系统明确且蕴含丰富儒家礼治思想的官员服饰制度:祭服,官员助祭、祭祀礼服,衣裳上玄下纁,以冕冠旒数、章纹数量、服装质地等划分等级;朝服,君臣朝会之服饰,深衣或五时袍服,以冠帽及饰物、绶的颜色长度、佩刀饰物等辨别差异。永平年间(58~75年)服饰定制使得东汉官员服饰制度具有明确的场合性,并以等级性为主要特征。当时皇帝、三公九卿等祭祀天地明堂,均着旒冕祭服,上玄衣下纁裳,等级区别主要体现在衣裳上绘绣的章纹数量的多寡之上:天子为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九卿为山龙九章,九卿之下为华虫七章,配饰有大佩等,足服则为赤舄纁履。其他随祭官员则头戴长冠,皆着衿服。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交融极为频繁,遂造成服饰面貌的繁杂多样。针对官员服饰而言,既有对两汉相关制度的借鉴传袭,又有依据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变革损益。魏晋官员服饰以汉制为蓝本,祭服、朝服制度进一步完善,主要以冠帽款式别职守、装饰材质分级别,崇尚褒服宽袖、衣带飘逸的时代风格。魏明帝时期以官员衮衣章纹的黼黻纹饰对天子礼服权威性有所挑衅,遂令人进行大幅度削减,自此定制——天子祭服为刺绣纹,公卿祭服为织成纹。在朝服方面,曹魏时期官员随官品颁受朝

服,既有五时朝服、四时朝服,还有朝服。曹魏官员的祭服、朝服制度一直延续至两晋时期,多所继承、守而无变。魏晋王朝更替奉行五德终始说,晋朝以金德自居,崇尚白色,故白绢所制的秋服在官服中最为尊贵。两晋时期虽然名义上百官仍有五时朝服,但朝廷却只三年颁授一次四时朝服,而阙秋服。

2 南北至一统官员服制交融

北朝诸代官服多在制度层面上依托汉魏衣冠,而在现实层面上则着本民族服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官员服饰改革。北魏太武帝时期完整的礼仪服饰尚未成型,虽然已经积极学习中原礼制典籍,但仍呈现出鲜卑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服饰杂糅共用的状况。此后,北魏官员服饰制度改革历经了三个阶段:一是北魏道武帝天兴年间(398~404年)初步定制。自晋室南迁,传统中原礼仪多有缺失,为此北魏天兴六年(403年),道武帝下诏令有司依照魏晋冠冕制定礼服体系以区别官员品秩等差,然结果差强人意未能系统恢复旧制。二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渐见规模。孝文帝时期令人依据经典考证史实,勘定前朝服制之误,进一步采取措施完善衣冠制度,但是仍不能周全和洽。三是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516~518年)完善定制。熙平二年(517年),当朝太傅、黄门侍郎等官员奏请依据汉代旧制,官员着五时朝服,五郊祭祀衣帻则如五方色。至此,北魏历经多位皇帝的不断修订终于建立系统的官员服饰制度,并为北齐所一脉承继,北齐河清年间(562~565年),武成帝遂要求将北魏确定的官服体系写入法令并严格执行。这样,经过改制的北魏官服遂与民间服饰形成胡汉两种服制:在北魏官服推行汉化的同时,其治下的汉民族也将鲜卑族着装风格带入日常生活领域,遂使北魏在遵从汉魏古制的旗号下,呈现出对南北服制选择性、变易性的扬弃特征。

及至北齐时期,官员的朝服、公服制度进一步细化,为北周时期胡汉服饰融合并制度化

奠定基础。史籍记载北齐官员七品以上着具服即为朝服,首服为配有簪导的冠或帻;身服为绛纱单衣,领、袖、襜皆为黑色,内着曲领方心的白纱中单;配饰为革带、蔽膝、白笔、绶、剑、佩等;足服为舄、袜。流外四品以上八品以下官员着从省服即为公服,首服为冠或帻,身服为纱单衣、深衣,配饰为革带、假带等,足服为履袜。“流外五品以下,九品以上,皆著襦衣为公服。”^[3]北周武帝时期远托周礼,近据汉魏、江左、山东之文化进行改制,遂形成胡汉融合的官员服饰制度,即官员在祭祀、朝会之时,着汉魏风格的大礼服,而在普通场合则以胡式圆领袍服为主。“(北周)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3]250}北周静帝时期官服体系更加细致周密,大象二年(580年)下令官员在重大礼仪场合着汉魏冠冕,而皇宫宿卫、天台近侍均依五方色着五色衣,衣服之边缘加锦绣、绮纁等装饰,谓之品色衣,则开后世官员常服的先河。这时的圆领窄袖袍服称为常服,与上衣下裤的鲜卑服不同的是袍服为一身连体,首服也由鲜卑帽转化为幘头。幘头与袍服构成的常服在北周得以成型,并于隋唐时期成为官员礼服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北朝官员服饰的繁杂多变,南朝诸代奉汉魏为正统,不仅祭服、朝服层次分明、制度齐备,更重要的是将秦汉时以职分等的礼服诸冠逐渐发展成为以品分等,等级性与标识性更加突出。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年),诏有司议定修缮祭服的五冕制,以此规范官员在朝会、饗猎等场合所服合乎礼仪规范。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对宋以来的官员祭服制度依据史籍经典进一步规范,即一方面参照《周礼》礼数,将原有三公青玉珠冕七旒改为冕八旒,卿大夫黑玉珠冕五旒改为冕六旒;另一方面,依照两汉旧制祭服之章纹数量加以修订,三公祭服章纹为山龙九章,卿祭服章纹为华虫七章。隋朝统一天下之后,远承汉魏旧制近接南北服制要

素,遂逐步制定大一统王朝的官员服饰体系,包括祭服、朝服、公服、袴褶服、常服等。隋文帝初创大统,元正朝会之时礼仪制度都未能齐全。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大量缴获器物、衣冠,才开始依据实物、详参古籍制定本朝服制,但较为简单寒碜。当时文武百官出入宫廷与办公场所均着圆领黄袍是为常服,形制与普通百姓区别不大。隋文帝上朝礼服也是圆领黄袍,只是腰带为十三环蹀躞带与官员加以别分。随着隋朝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人,参照历代典章制度修订衣冠服制,自此上至天子下至黎庶,各色人等服章之制皆有层级。

正是基于隋代服制的详定,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颁行车舆衣服之令,制定了翔实的官员服饰体系,遂成为西周服饰成型以来最为详备的舆服制度。唐朝历代皇帝虽对武德令或有调整、改动,但基本保持了原有面貌。《旧唐书·舆服志》:“(官员)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经过不断规范调整,在理想层面官员服饰体系更为翔实规范,在制度层面祭服、朝服、公服等大礼服详述典籍,而在现实层面袴褶服、常服则以等级化姿态大行其道。大礼服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因而祭服、朝服和公服具有较大的继承性和保守性,而礼仪化的袴褶服、常服在初盛唐时期实际履行了朝服、公服的职守。初盛唐时期官员着袴褶服,各依本品着首服,若非大仪仗陪位首服可为平巾幘;至于袴褶服质地也有明确等级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为细绫、罗,六品以下官员则为小绫。盛唐以后,袴褶服逐渐退出礼服体系。常服则终唐一代颇为盛行,时代特征较为鲜明:初盛唐时期流行胡式风格,中晚唐时期则多为汉式风尚。唐代官员常服之首服为幘头,还一度有进德冠;身服为圆领襦袍衫,夏季着衫,余季穿袍,下长及踝,以紫、绯、绿、青等服色区别等级;足服为乌皮六合靴,饰物有腰带、鱼(龟)袋、笏等。《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睿宗景云二

年十月:“默啜许诺,明日,幘头,衣紫衫,南向再拜,称臣。”胡三省注:“幘头、紫衫、唐三品以上之服也。幘头起于后周,便武事者也。太宗时,马周上议,以礼无服衫之文,请加襴袖襦。”

3 汉唐官服一元双轨纵横谈

服饰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多重职能,一方面具有防寒、蔽体、遮羞的基础功能,另一方面还具有阶级社会外在展现的规范性、礼仪性、级别性,是皇权统治的物化表征,后者在官员服饰上尤其凸显:官员阶层既是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皇权维护统治的外朝工具,这种既从属又隔离的复杂身份决定了官员服饰的殊别性,其被赋予政治、伦理、身份等多重涵义,是古代社会封建伦理、等级礼制的突出体现,因此,官员服饰的质地、款式、纹样、配饰等均以制度、法令的形式严加规范,遂成为古代社会皇权政治的符号与图示。汉唐时期官员服饰制度经历了汉魏初创、南北朝融合、隋唐渐次成熟的漫长发展历程。汉唐历朝以重建王权政治的中心地位为目标,积极应对周边文化的挑战,并包兼容又众长博采,使得官员祭服、朝服等大礼服体系日渐完善,最重要的是隋唐阶段将北朝以来胡汉融合且初步定制的常服进一步规范化,成为官员的正式礼服。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制度虽然颇为繁杂,然其来源主要有三,即一为北魏、北齐,二为梁、陈,三为西魏、北周^[4]。隋唐时期官员服饰的大礼服体系,传承了北魏直接沿袭汉魏旧制、于北周集大成的宽袍博袖的汉式服装,作为祭祀之礼服、上朝之礼服、办公之礼服。另一类小礼服则继承了北齐、北周改革后的窄袖圆领袍衫,并糅合相应的时代特色,成为适合朝堂礼仪规范的常服。这样,官员服制遂从汉魏时期的单一模式变成隋唐之时的复合体系,实现一元到双轨的发展变迁,而大、小礼服两套服制各自发展又互相补充,被后世广泛吸收借鉴,一直沿用到明代才逐渐消退。

具体到汉唐时期的各个朝代,官员服制的发展变迁离不开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文化体系。汉唐时期总体环境是合——分——合的状态。在帝国初期政权未稳,各种制度尚不完善,通常以承袭前朝为主,官员服饰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而继承的范围则是多元的,从不同朝代、不同地域汲取营养是承袭的一个主要手段。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国力渐次强大,该时的治理观念则为加强统治、巩固集权,这样必然会直接加剧服饰的政治化导向,作为皇权政治外在表征的官员服饰,自然会站在礼仪制度变革的最前沿。正如《后汉书·舆服志上》所言,“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缡”。而当一个王朝油尽灯枯之际,也是官员服饰杂乱无序、怪象繁出之时,时代与社会遂静候下一个王朝的到来。可以说,官员服饰制度是汉唐时期政治运转、时代变迁的显示器,不断裂变与多元传承始终贯穿持续 1,100 余年的汉唐的整个阶段,既有直接的承继,亦有多维的变动,更有在正统理念传承中对服饰形与制的改革与创新!

总之,汉唐时期官员服饰是帝国树立政治权威、颁行教化正统的重要措施和外在表现,而出于历代服饰发展政治性与融合性统一的时代需要,汉唐各朝通过不断调试、改进,极力建立适合自身法统与道统的官服体系,应该说,这一体系的实施和运行在维护政权大一统地位、强化集权统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晋]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166.
[Jin Dynasty]YUAN Hong.Hou-Han-Ji [M].Beijing:Zhong hua Book Company,2002:166.
- [2][宋]徐天麟.东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07.
[Song Dynasty]XU Tian-lin.Donghan -huiyao [M].Beijing:Zhong hua Book Company,1955:107.
- [3][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42.
[Tang Dynasty]WEI Zheng, etc.Sui-Shu [M].Beijing:Zhong hua Book Company,1973:242.
-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
CHEN Ying-que.The Collection of the Theses on System Origin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77:1.

(责任编辑:李强)